

试析日本改变“战后体制”的 多边外交动向

吕耀东

摘要:近年来,日本政要加强对外宣传“历史修正主义”的多边外交活动,力图让国际社会接受日本改变“战后体制”的政治诉求;以日本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寻求世人同情,力邀 G7 等各国政要及民众访问广岛长崎“原爆地”;以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国际贡献”标榜“永久和平”;借申请世界文化及人类记忆遗产,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革“申遗”制度,营造改变“战后体制”的国际舆论,淡化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历史。2015 年安倍首相的“8.14 谈话”是力图改变“战后体制”的国际宣言。这样的言行恶化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实现“历史和解”的政治氛围,也凸显了日本多边外交影响国际舆论的深层意图。

关键词:日本 多边外交 G7 峰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遗产 历史修正主义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晓博

近年来,日本政府常利用多边外交谋求改变“战后体制”。^① 多边外交是指三个以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常设的或特别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中的互动。随着国际组织的发展和成员国增加,多边外交越来越重要。日本政府为了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摆脱二战时期侵略他国的负面影响,达到提升本国形象的目的,主动对国际社会展开了一系列多边外交活动。其意图在为本国的政治诉求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并影响国际舆论氛围。安倍政府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对国际社会展开全方位的多边外交,力图淡化军

国主义侵略历史,实现改变“战后体制”的政治诉求。

在 2015 年日本战败投降 70 周年之际,日本首相安倍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答辩,称摆脱战后体制是对内政而言的,并不是要挑战战后体制。^② 而日本前财务相藤井裕久指出“安倍首相提出的‘摆脱战后体制’可以被解读为二战后自民党所为都是错误的。自民党的前辈们在(战后)70 年中为和平作出了不懈努力,而安倍却试图破坏这一切。”本文认为,所谓“战后体制”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基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而铲除军国

^① 早在 1972 年 7 月,田中角荣政府上台后表明了“多边自主外交”的对外战略理念。其核心是改变过去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地制订日本的对外战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多边往来,发挥日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作用。冷战后的日本多边外交反映出外交自主化倾向和政治大国化意向。

^② 安倍首相在 2015 年 3 月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答辩称“我完全不是历史修正主义者。摆脱‘战后体制’是对内政而言的,并不是要挑战战后体制之类的主张。”共同社 2015 年 3 月 4 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5/03/93077.html>.

主义政治经济基础,剥夺日本部分国家对外职能的法规及制度安排。日本政府以战后走和平主义道路为由头,利用 G7 峰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性组织平台,通过渲染二战日本“原爆”受害者身份、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申遗”及公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各种外交行为方式,否认甚至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颂扬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和“国际贡献”。日本一系列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无视遭受侵略国家及地区民众的民族感情,导致日本与中韩等周边国家之间国民情绪对立。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言行。本文就日本政府基于改变“战后体制”的多边外交行为对象、行为方式及行为目的进行具体探讨。

一、力邀各国政要及民众赴广岛长崎“原爆地”,强调“受害者”身份

一直以来,日本因二战侵略行径导致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不足,因而十分重视开展多边外交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力求改变外部世界的对日认知,竭力淡化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记忆。在日本战败投降 70 多年后,日本的多边外交逐渐形成具有面向国际组织、自主性和主动性等特征。它按照日本政府的意志向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传播所谓“积极的和平主义”,影响他国的对日外交政策理念,力求他国及国际社会认可其改变“战后体制”的意愿。

2015 年初,日本政府就向外界透露,作为在核爆地广岛当选议员的外相岸田文雄,将出席 4 至 5 月在纽约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还将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呼吁核裁军及核不扩散的必要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从 1995 年开始每 5 年召开一次。各缔约国意在检验自 1970 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的实施情况。为何近 10 年来日本外相不曾出席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突然间成为日本政府关注的焦点,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借这一国际会议平台,以反对核扩散为由头,标榜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成就,强

调日本也是二战受害国的政治诉求,力求在“历史节点”影响国际舆论。

近年来,日本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力度,据统计,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核爆资料馆 2014 年度入馆人数中,外国参观者达 234 360 人次,比 2013 年度增加了约 3.4 万人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2015 年度参观人数高达 1 495 065 人次,为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核爆资料馆开馆以来第 5 高值。较上年度增加约 18 万人次,其中外国参观者增加约 104 500 人次至 338 891 人次,创历史新高。据分析,外国参观者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 2015 年夏季山口县举办全球各地童子军聚会活动,加之美国旅游网站持续给核爆资料馆打出高分。^①

2015 年 2 月,长崎市市长田上富久对外界表明邀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参加 8 月 9 日原子弹爆炸 70 周年举行的和平祈愿仪式的意向。他表示“在这有纪念意义的年份里,希望从长崎向世界发出呼吁废除核武器的讯息”,还计划邀请当年的核爆受害者及遇难者遗属参加。此外,长崎市准备对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核爆资料实施连续 3 年的调查。长崎市已经正式邀请奥巴马总统访问长崎,并且强烈希望中国、韩国等邻近各国的首脑能够前来访问。2015 年 4 月,担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主席的阿尔及利亚外交官塔乌斯·费鲁基访问了长崎。

在 2015 年 4 月底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特别提及 2015 年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 70 周年,指出 70 年前的原子弹爆炸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并表示“作为来自核爆受害地广岛的外相,将为实现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积极努力”,呼吁加速世界核裁军进程。此举旨在使世人改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形象,表明日本也是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岸田文雄提议的草案中有呼吁“全球领导人访问原子弹爆炸受害地广岛、长崎”的内容,由于中国等国家的反对,这部分文字被删去。^② 中方认为,虽然对遇难者抱以同情,但反对日本政府利用《不扩散核武器条

① 《广岛核爆资料馆外国参观者数量创新高》,共同社 2016 年 4 月 20 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4/118827.html>.

② 原野城治「戦後 70 年目の原子爆弾被爆地『ナガサキ』を訪ねて」。<http://www.nippon.com/ja/features/c02302/>.

约》审议大会对二战反法西斯正义性的曲解,并借“核不扩散”凸显日本也是“受害者”的形象。岸田还在纽约举行的广岛长崎宣传集会致辞中称“作为唯一的核爆受害国,主导国际社会的努力是日本的使命。”5月4日,日本长崎市长田上富久在华盛顿与美国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高特莫勒举行会谈,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出了访问广岛、长崎的邀请。岸田外相于5月13日称,“就营造实现无核武世界的氛围而言,(全球领导人访问核爆地)十分重要”,表示会努力使之写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最终文件中。5月15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三个主要委员会中,日本外交官在会场外与外国代表交谈,希望对方“正确理解日本的立场”。中国裁军大使傅聪在第一委员会的公开讨论中重申了对日方倡议“全球领导人访问核爆地”的反对立场,强调不需要再讨论。他认为,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突出强调遭受核爆的痛苦,试图淡化其作为军国主义“加害者”的立场。为此,日本紧急派出外务省要员杉山晋辅奔赴纽约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现场,加强对相关国家的游说,通过加强代表团阵容来谋求更多国家支持。

2016年4月初,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广岛市就该市举行的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向媒体表示,G7外长将访问广岛核爆资料馆并向核爆慰灵碑献花,此举意在向国际社会呼吁推进核裁军及核不扩散。他向媒体强调“全球的领导人访问核爆地、了解核爆受害的实际情况对于为实现‘无核武世界’创造氛围非常重要。”“希望能从核爆受害地广岛发出强有力的核裁军及核不扩散的讯息。”岸田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等G7外长于11日前往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核爆资料馆参观,并向核爆慰灵碑献花。岸田强调其意义称“这是历史性的日子。”G7外长会后发表《广岛宣言》称,投放原子弹导致广岛和长崎经历了“极为严重的毁坏和非人的苦难”,希望各国领导人造访核爆地,期待倡导实现“无核武世界”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首访核爆地。^①日本终于让70年前投下原子弹的美国及英法等拥核国外长访问广岛

“核爆地”,借主办G7峰会凸显日本也是二战“受害国”身份的长久意图也得以实现。

国际首脑会议是最高层次的多边外交形式。可以说,日本有意借主办G7首脑峰会大做文章,加强多边外交攻势,力促G7各国政要“亲身体会遭遇原子弹轰炸的实情”,并进一步要求全球领导人及世人访问广岛、长崎核爆发生地,有意强调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原子弹受害国的立场,突出强调日本民众是核爆的受害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后,刻意淡化日本军国主义加害者的国际负面形象。

二、以“申遗”外交掩盖日本殖民主义侵略史实

在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之际,对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申请“世界遗产”一事,日本政府动作连连,将“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作为日本近代化成就和典范加以申报。日本的目标是实现2015年夏季的世界文化遗产登录,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九州、山口与关联地区(福冈、长崎、鹿儿岛等八县)等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的申报。因世界文化遗产的推荐,一年只有一个名额。日本政府认为“向世界展示从明治维新开始一脉相承的日本独特的制造文化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以九州及山口县为中心,包括8个县的28处资产,其中九州包括福冈县的八幡制铁厂及长崎县的长崎造船厂等最为突出。日本内阁官房2015年优先推荐明治工业革命遗产的重点是,由端岛(位于长崎市,通称军舰岛)与三池港(福冈大牟田市)等,是与日本工业化的历史有着密切联系的碳矿、制铁和造船等资产的遗迹。

对于日本政府已经确定推荐“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申遗,日本媒体评论道“总体来看,那一时期,即明治时期的工业革命文化遗产,有着相当的代表性。是东方最早的工业革命成功的典范,也对现今日本的社会文化有很深的影响。当然,地域性的限制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毕竟工业革命成功后的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文化输出与西方国家有差距,

^① 《G7外长发表广岛宣言称核爆带来非人的苦难》,共同社2016年4月11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4/118195.html>.

且从之后的历史来看,其输出的很多东西也不是工业革命成功的果实,而是很负面的东西”。^①这样的中肯评论暗指,日本在明治工业革命后对于亚洲邻国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负面”历史。这也明示了日本政府力求通过在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之际提升国际形象不会一帆风顺。

对于“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建议名单一事,作为邻国的韩国提出反对意见。韩方就日本“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议名单的23处设施指出,位于福冈县和长崎县等的7处设施在建设时共强征约5.79万朝鲜半岛劳工,违反了“保护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遗产”这一世界遗产公约精神。日方竭力向韩方介绍日本工业革命遗址的历史价值,强调其能向现今展现明治时期日本的发展历程,力求获得韩方的理解。日方还力图在了解韩国主张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对方配合“申遗”。日方此举意在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与因历史认识问题关系陷入冷却的韩国展开对话的积极姿态,提升日本的“亲和力”,努力为正式“入遗”创造有利氛围。

但是,日方却在国际舆论上竭力淡化其殖民历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5年5月8日就韩国政府反对“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建议名单一事表示,“将关注韩方的反应,尽最大努力争取获得赞同。”外相岸田文雄向媒体介绍称,相关遗址的对象年份为“19世纪50年代至1910年”。岸田就韩国提出列入建议名单的设施中包括强征朝鲜半岛劳工工作地点一事提出反驳,称“年代、历史定位和背景都不一样”。“作为产业遗址,着眼于显著的普世价值。期待从技术上、从专家角度进行审议。”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对媒体称“此事不应加入政治主张”,称日韩政府间应展开磋商,并表示考虑向韩国以外的国家也寻求支持。5月11日,日韩·韩日议员联盟联合干事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日韩议联干事长河村建夫就“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申遗称“这是日本完成近代化时的历史遗产。虽然不否认之后曾征用(劳工),但(申遗涉及的年代)时期不同。”希望能获得韩方理解。然而,这样的言论韩方并不认可。5月20日,韩国总

统朴槿惠与到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会谈,批评日本将“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一事,强调日本无视其部分设施有着非人道强征劳工的历史,且明确表示“这违背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将导致国家间不必要的对立”。朴槿惠总统就日本殖民时代对朝鲜半岛造成的损失对外发声,博科娃总干事表示会把朴槿惠的意见“传达给世界遗产委员会”。

日方不愿看到“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因为历史问题而受到指责,试图在审查现场制约韩国发表异议。日本政府为了对抗韩方的反对意见,派遣8名首相特使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国德国等15国,为“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寻求国际舆论支持。日本政府就“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符合申遗标准列举了三点理由:(1)作为19世纪50年代至1910年的工业遗址具有价值;(2)遗址的对象时代与征用朝鲜半岛劳工的时期不同;(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机构已建议将其列入世遗名录。显然,这三点理由有意回避该遗产后来对亚洲各国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事实。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将福冈等8县23处设施构成的产业革命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有必要作出促成对设施“历史全貌的理解”的说明。韩方也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建议本身“就反映了韩国的立场”,认为该建议要求加入日本20世纪40年代使用朝鲜半岛劳工劳动的事实说明。韩方提出的同意申遗的条件是,日本在介绍对象设施历史时要提及曾强征过朝鲜半岛劳工。日方起先对这一要求持拒绝态度。6月21日,岸田文雄外相与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就“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问题达成部分“妥协”,日本承认二战时征用朝鲜半岛劳工政策,日本政府在参观者介绍资料中写进对象设施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

7月5日,在德国波恩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定把“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

^① 『『明治日本の産業革命遺産』を推薦へ』、『毎日新聞』2013年9月14日。

织日本代表佐藤地在表决后承认“在违背本人意愿情况下,有许多朝鲜半岛民众被带走并在严苛环境下劳动,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实施了征用政策”,表示考虑设立相关设施等以留下这段记忆。

日本在此次申遗过程中,一直无视其中存在的强征劳工问题。直到韩方围绕这一问题与日本持续磋商后,日方才最终承认二战时征用朝鲜半岛劳工政策。但安倍就申遗成功表示“再次坚定了保护这一传递祖辈伟业的杰出遗产和让后代继承的决心。”这无疑源于应重塑国家自豪感的“安倍自身历史观”。日本政要丝毫没有就殖民朝鲜半岛及强征劳工用于“明治产业”而道歉,岸田文雄外相甚至向媒体表示“期待以此为契机,让更多人了解(明治日本的工业革命)遗产所发挥的全球性作用。”可见日本政要淡化日本殖民主义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意味浓厚。

三、针对“南京大屠杀”入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难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日本战败 70 周年之际,日本发起外交攻势,将发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作为其改变“战后体制”战略意图的重要步骤之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通过“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管理世界遗产及“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报工作。所谓“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的文献遗产项目。该项目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侧重于文献资料记录,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各种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手稿、珍贵文件、口述历史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等。项目实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世界记忆文献遗产。

2015 年,中国与日本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世界记忆遗产申报文本并进入审核环节。其中,日本申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伯利亚扣留”相关档案和国宝“东寺百合文件”;中国申报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档案。日本政要对中国将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极为不满。官房长官菅义伟于 10 月 2 日在记者会上称,日方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达了“遭政治利用的担忧”,

要求其慎重审议。10 月 10 日,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已成功登录《世界记忆名录》,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川村泰久发表谈话,要求修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制度,妄指中方“政治利用”该制度。他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理应公平中立的国际组织存在着问题,我们感到极为遗憾。我国作为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之一将要求实施制度改革,使其不被政治利用”。他还说,“申报项目基于中国的单方面主张,档案真实性和完整性显然有问题。”在日本方面看来,根据现行记忆遗产审查标准,只有档案保管和管理的必要性被作为审查对象,是否具有历史正确性则并非评判材料。因此,日本政府或将要求修改标准。同日,日本外务省还发表了一份谈话,认为教科文组织无视日本政府的多次要求,偏听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有失国际组织“中立、公正”的原则,因此准备向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抗议,并冻结日本政府计划支付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担经费。可以看出,日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大出资国”的“名份”,批评教科文组织无视“日本的贡献”,甚至不顾日本的国际形象,“要挟”冻结计划支付给教科文组织的分担经费,要求改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制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次的审议中,日本政府递交的战后日本人被苏联红军羁押在西伯利亚的历史档案资料“回到舞鹤港的生还”资料也获得登录,被俄罗斯方面认为也有“政治利用”意味,及时揭露了日本“双重标准”的虚伪面目。

2015 年 10 月 13 日,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一事对媒体表示,日本政府已着手研究对抗措施,包括考虑停止或削减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费支持。他还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质疑称:“围绕相关事实存在意见分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根据中方的意见作出决定是不合适的”。他强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是一个为各国的友好发展发挥作用的机构,强烈要求改变这种会被政治利用的制度和机制”。这些言论完全无视二战后“东京审判”关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同日,对于日方“反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

示,日方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公然威胁的言论令人震惊,完全不能接受。她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问题上秉持了客观专业的立场,中方对此予以充分肯定。日方在这个问题上一再干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常工作,并且公然发出威胁的言论,只能再次充分暴露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迄今仍在顽固坚持错误历史观。华春莹还表示,日方可以威胁削减对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经费,但是日方抹不去历史污点,而且只会越抹越黑。

10月14日,日本自民党外交小组通过决议,就《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一事要求政府敦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撤回该决定并改革审查制度。建议在审查世界记忆遗产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等机构中启用日本专家,就南京大屠杀及慰安妇问题与海外学者开展共同研究,加强日本的对外宣传。岸田文雄表示,日本政府认为应该优先致力于修改世界记忆遗产登录制度。对于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有呼声要求停止或削减对教科文组织的经费支持一事,岸田担忧会招致国际舆论的“误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也称,如果日本停止或削减经费的话,“只会进一步降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是自掘坟墓”。为此,日本进行了策略调整,将重点放在“改革”世界记忆遗产登录制度的多边外交方面,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二大经费承担者的身份,力举日本咨询委员当选。

为了制造“改革”世界记忆遗产登录制度的国际舆论氛围,日本文部科学相驰浩于2015年11月5日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呼吁改善世界记忆遗产登录制度。他表示“为了尽早实现包括组织管理和透明度提升等方面的一系列改善,有必要推进有关讨论”。他“充分”利用联合国的话语平台,寻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的赞同。日本政府为了达到改变“战后体制”的意图,一方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呼吁改善世界记忆遗产登录制度,另一方面拟向对审查有影响力的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相关机构派遣日本方面的咨询委员,为昔日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开脱罪责,力图提高发言权。另外,日本针对中国和韩国有申报随军慰安妇相关资料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动向,力求尽快建立能够反映“日本意见”的舆论格局。

日本积极开展舆论攻势,根据日韩两国政府于2015年12月底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共识,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于2016年初对媒体表示,根据日韩两国达成的协议宗旨,韩国是不会与中国一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慰安妇历史资料的世界记忆遗产的。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言论“没有事实根据”,并对于上述说法予以否认。

近年来,日本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视作国际文化交流场所而不断发动多边外交攻势。日本反复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善记忆遗产登录制度,以确保所谓“公平性”和“透明性”,迫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6年4月14日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①通过了修改“世界记忆遗产”指南的相关决议。日本媒体称,此次决议写明要“确保透明度”和“顾及导致争论的可能性”等,力争避免成员国之间的对立。^②可以说,日本或拟停止或削减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费支持,或谋求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改世界记忆遗产登录制度,这些行为均是日本向联合国发动的外交舆论攻势,力图改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评审规则,以达到改变“战后体制”的战略目的。

结 语

多边外交是不同国家间相互沟通和打交道的新形式,也是不同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均可利用的形式。^③在日本战败投降70年之后,摆脱和改变“战后体制”成为日本多边外交的重要议题。安倍首相十分重视在国际上开展多边外交,并在“战略性外交”中赋予多边外交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日本政府不是在深刻反省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

① 教科文组织等联合国专门机构都有一个执行机关,其职责是为执行的决议提出建议、计划和工作方案,并付诸实施。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页。

② 《教科文组织通过修改记忆遗产指南的决议》,共同社2016年4月14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4/118485.html>。

③ 鲁毅、杨闯、周启朋等《外交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罪行的基础上,谋求广大亚洲受害国及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理解,而是以“申遗”外交、发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发表淡化和掩饰侵略历史的首相谈话来否认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竭力标榜战后70年的所谓“和平主义”及“国际贡献”,力图以此抹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图谋改变“战后体制”,提升日本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可以说,安倍2015年“8.14谈话”就是日本“战后总决算”的国际宣言。

日本右翼和一些保守势力的种种言行,旨在加强对外宣传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历史观,力求让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接受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诉求,以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国际贡献”,谋求他们对日本也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借主办G7峰会,力邀各国政要及民众赴广岛长崎“原爆地”标榜“永久和平”,营造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有利的国际舆论,进而淡化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广岛市长松井一实甚至称“将不要求奥巴马(访日)道歉,希望与核爆受害者交流”。^①对此,韩国媒体疾呼“最重要的是韩国担心此次访问会成为稀释日帝错误,传递出日本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信息”。在“日本还未完全获得韩中两国等受害国家的原谅”的情况下,“即使奥巴马前往广岛,美国也要明确表示这并非日帝暴行的免罪符”。^②

事实表明,安倍关于历史修正主义理念得到了一些日本民众的认可和肯定。安倍充分煽动和利用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否认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寻求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支持,延续其政治生命,力求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战略意图。2012年底,第二届安倍政府上台后即表示“将制定面向未来的内容”。安倍无疑是想实现其第一届政府(2006年至2007年)时代的“摆脱战后体制”目标。他曾于2013年4月在国会答辩时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还没有定论”,就写入“对殖

民统治和侵略的反省”的“村山谈话”表达了消极的见解。安倍2015年“8.14谈话”的对象是亚洲曾经饱受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民众,它以“谈话”的舆论形式宣扬“历史修正主义”,力图达到要求亚洲各国接受其历史观的目的。安倍在“8.14谈话”中妄言的“不能让后代背负持续道歉的宿命”的民族主义煽动性语言,将日本部分民众一并捆绑在其历史修正主义的疯狂行动中。安倍不断以恶化“历史问题”和伤害中韩等亚洲受害国的民族感情,来激起受害国民众的强烈抗议和谴责。而后却反诬是要求日本屡屡道歉,是形成东亚国家和民族间对立和对抗的现实原因。可以预见,安倍“8.14谈话”将对日本国内政治走向产生深远的舆论导向性影响。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70年后,对于二战加害国的日本而言,本应该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但安倍在2015年的“8.14谈话”中将“事变、侵略、战争”并列在没有面向中韩等战争受害国的语境下,竭力淡化军国主义侵略罪行。而且有关日本殖民侵略台湾的话语中,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关于遵守《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承诺,表现出否定“村山谈话”的“历史性大倒退”。安倍违背反省日本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精神,是其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主要例证。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在做好同其他国家政府处理关系的同时,积极开展同他国民众的交流和沟通,越来越成为新时期一个国家外交日程中的重要问题。然而,“历史问题”使得日本多边外交的作用和效果大打折扣。日本力图通过多边外交否认侵略历史的错误态度,既遭到东亚邻国的强烈反对,也很难消除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在亚洲民众心中留下的历史阴影。日本与亚洲及国际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导致了日本多边外交缺乏与中韩等国形成最基本的信任和沟通基础。

① 《广岛市长称将不要求奥巴马道歉 希望与核爆受害者交流》,共同社2016年4月21日。<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4/118891.html>.

② 《克里访问广岛 这不能成为日帝的免罪符》,《韩》《中央日报》2016年4月12日。http://chinese.joins.com/gb/article.do?method=detail&art_id=150399&category=002005.